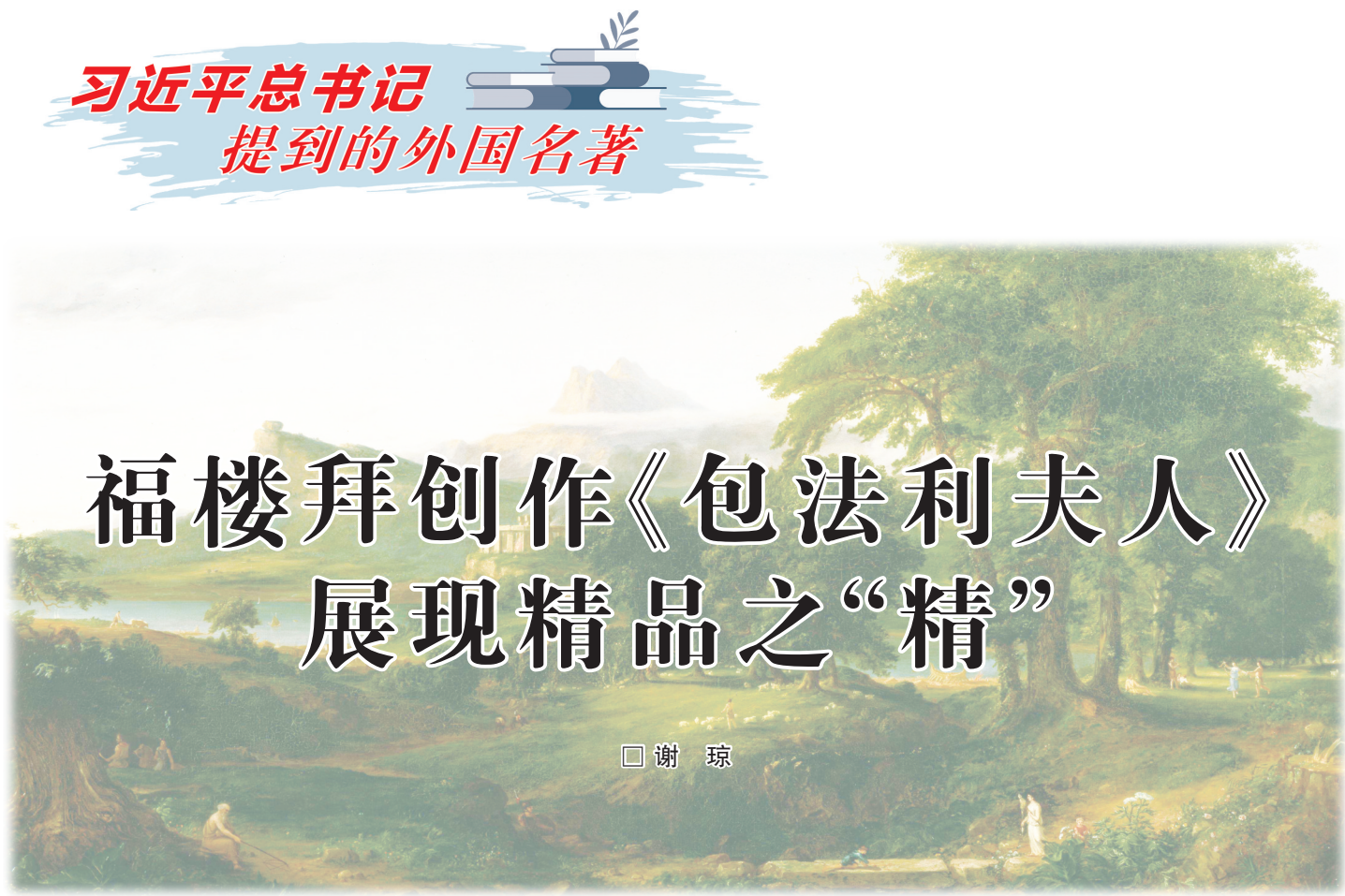




□ 谢 琼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谈道，“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福楼拜说，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

这不是福楼拜第一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法国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讲道：“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显然，习近平总书记对法国文学是非常的热爱与熟悉，他还讲道：“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法国负笈求学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人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由于这个原因，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用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例子，来阐释文艺作品创作时应力求精益求精，正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对文学作品的熟悉，同样对文学创作者的特点与把握也十分精准而贴切。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是十九世纪中叶继巴尔扎克之后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继承了十九世纪前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又为十九世纪后期

的作家所师承，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于1821年12月21日出生在鲁昂一个世代为医的家庭里。1845年父亲死后，他搬到鲁昂近郊的克鲁瓦塞庄园居住，埋头写作，就在那里终其一生。从1852年起，福楼拜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事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的写作。福楼拜并不急于发表作品，他说：“出名不是我主要关心的事。”他不想再走前人已经走过的路，“我寻找的不是港口，而是大海”，他要闯出自己的新路。1856年《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在《巴黎评论》上发表后轰动了文坛，福楼拜获得了盛誉。但小说的批判锋芒触犯了当局，福楼拜受到控告。这场官司对福楼拜产生很大压力，他于是从写当代生活题材转向写古代，埋头写作五六年之久。

福楼拜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塑造典型上，他善于在一个篇幅不算很长的小说中塑造一系列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为了塑造典型，福楼拜十分注意事物、细节的真实，更十分注重环境描写。为了锤炼语言和句子，福楼拜总是苦心推敲。他的稿本总是经过反复修改，以求词章、结构、意境尽可能完美。他每部作品的写作都要花费若干年之久。他在句子结构、词汇节奏、音响效果、表达准确上苦心经营，常常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而苦恼：“我越是在艺术中获得经验，这艺术对我来说就越变成一种酷刑……我相信，很少有人像我那样为文学而忍受那么大的苦痛。”

福楼拜最重要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再现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

活，描绘了鲜明逼真的人物形象，具有巨大的揭露意义，成为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包法利夫人》描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女子的悲剧，小说通过爱玛的经历对恶浊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愤怒的抗议，作者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包法利夫人的堕落过程，使作品具有巨大的揭露力量。在小说中，福楼拜把爱玛堕落的责任归于不健康的宗教生活和文

化生活、单调沉闷的外省环境和腐化淫荡的社会习俗。他认为不道德的不是爱玛，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他透过资本主义文明的华丽薄纱，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精神堕落及其带来的可悲后果，并对那种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腐朽、侈谈资产阶级道德的高调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从而表明了小说真正正正的道德立场和健康的思想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讲道：“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的过程也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包法利夫人》是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的一幅现实主义画卷，小说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物作了淋漓尽致

《尚书》为“政书”之祖，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政治历史文献汇编。《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尚书》诠释治国安民之道、盛衰兴废之理，引导修身务学，重在选贤举能，至言要道，备在此书。《尚书》中的“德”作为维持社会有序运行的一种契约，逐渐成为人民行为的规范，为后世留下重要参考。

圣王治世

一是圣王谱系。《尚书》中建构了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为代表的“二帝三王”的圣王谱系，集体完成了圣王治世在时间维度的建构。尧帝登基后，分命羲氏与和氏从东西南北不同方位观象记时；舜帝继位后从中央王朝出发，“五载一巡守”，考察诸侯政绩；大禹治理九州，按距离远近划分“五服”，确立了中央政府与边地民族的政治地缘关系，集体完成了圣王治世在空间维度的建构。

二是君圣臣贤。君王要认清自己的政治责任，以德治国、勤勉政事，才能配享天命。周公以勤劳自励，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他极为重视统治者勤政的品德，认为商纣亡国原因之一就是统治者缺乏勤劳品德，在《洛诰》篇中指出：“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尚书》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国家治理的史实表明：有德之君必有有德之臣辅佐。“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君臣之间相知相助、团结和谐、共商国事、勤政为民，君臣共治的稳定政治结构和良性互动才能带来政治安定与社会安宁，最终成就圣王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为后世树立了一个追慕与效仿的君圣臣贤治政典范。

三是克己慎行。良好的道德修养不仅来自学习和体悟，更来自实践的锤炼和考验。统治者需要在道德实践中不断提升修养，《洪范》篇反复强调君王要“无偏无陂”“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谆谆告诫君王治国的行为要中规中矩，不做失德之事，要以身作则、克己慎行，做到讲诚信、节

用度、尊农时、薄税赋，绥靖惠民，达到理想化的行为模式和人格模式，实现“内圣”之德到“外王”之功的转化才能“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同时做好考核。《尧典》记载，舜帝提出了“三载考绩”的官吏考核制度，当百官任命后，舜帝告诫他们各敬其职，政绩三年一考，经过三次考绩“黜陟幽明”，罢免庸官，提拔循吏。对于被考核的官员要“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发挥职业晋升激励、物质激励和心理激励的作用，激发“有猷有为有守”的官员更加主动作为，官员的考核评价对于国家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意义重大。

敬德保民

一是畏天恤民。统治者只有“敬德”“顺德”“行德”，才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否则上天会“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面对夏殷失德无道的历史教训，明白天命的承受取决于民心，“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民心即天心，天既有自然属性，也有人格属性，违背了民意就是违背了天意。《皋陶谟》讲：上天的视听善恶与民众一样，“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天按照人民的需求来行事，“天命”被赋予了道德内涵和社会伦理属性，民心向背决定了天命所归。

二是政在养民。民心归向和人民支持往往是朝代兴亡的决定因素，不论是“视民利用

迁”，还是“惟民之承保”，抑或是“用康保民”“保惠于庶民”，其核心还是和历代先王一样爱民保民，得天庇佑、永固基业。统治者要体味民众苦乐，“以庶邦惟正之供”，轻徭薄赋、节制奢侈，最终给百姓以安宁。把德与利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养民”的核心就是利民，只有顺乎民意而为，才能无为而无不

为。三是协和万邦。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与理想状态。《尚书》追求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皋陶谟》首句由皋陶提出“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的命题，《尧典》中指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通过推行大德，由家族和睦实现社会和睦，由社会和睦再协调万邦诸侯，形成“差序格局”和谐一体的地缘关系和政治秩序，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包容性、开放性和融合性。

彝伦攸叙

一是纳德入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将礼治与行政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礼建构金字塔结构的宗法统治秩序，“辨君臣、上下、长幼”，把礼由外在规范转入统治阶级的内在道德要求。《尚书》中蕴含着丰富的礼治思想，其中，祭祀作为礼的重要内容，而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洛诰》一篇就是周公和成王讨论定都和洛邑冬祭情况的辑录，成王“夙

（上接1版）

“两个确立”对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时”与“势”，辩证把握“危”与“机”，吹响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战斗号角，带领中国人民毫不畏惧、奋勇向前，以坚持不懈的斗争赢得了胜利。围绕政治安全这个根本，制定香港国安法，派驻香港国安公署，修改完善选举制度，粉碎了港版“颜色革命”，推动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围绕人民安全这个宗旨，举全国之力开展脱贫攻坚，消除了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围绕经济安全这个基础，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成为疫情发生后全球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围绕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围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外部安全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021年9月25日，被加拿大方面非法拘押1028天的孟晚舟平安回到祖国，这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回顾这些伟大斗争，其进程之艰苦卓绝、其奋斗之不屈不挠，足以写在建党百年的光辉史册上。实践充分证明，国家安全工作之所以得到历史性加强，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战略决断、英明领导。展望未来，我们要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工作，为强国之路、复兴大业保驾护航。

新时代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的宝贵经验

进入新时代，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的经验不断丰富，对在新征程上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启示。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新征程上，要把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深刻感悟，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确保国家安全工作牢牢掌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要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和《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规定》，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关键在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疫情袭来之际，党中央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惜一切代价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病患者。实践充分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国家安全工作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权益，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

坚持国家安全理论与时俱进。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呼唤着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与时俱进。党始终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作出正确战略决策，及时调整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在“站起来”阶段，我们更加注重安全；在“富起来”阶段，我们更加注重发展；在迎来“强起来”的阶段，我们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加速构建现代化的国家安全工作体系和工作能力。

坚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党在战胜风险挑战中成长为强大，始终有着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必须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忧患意识显著增强，应对风险能力显著提升，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临危不乱、危中寻机，打了一场又一场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党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斗争之艰难、流血牺牲之惨烈世所罕见。隐蔽战线上，革命先烈打入敌特机关、深入龙潭虎穴，置自身生死于度外，数次在关键时刻保卫了党中央安全。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严峻形势，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我们必须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要直面敌对势力挑战我们底线的行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持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是统一的，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强调的塑造国家安全，是要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安全环境。我们强调的塑造国家安全，是要把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各种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中国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新的赶考之路赋予新的时代责任，新的奋斗征程呼唤新的使命担当。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牢记“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全力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明德慎罚

一是德主刑辅。德与刑是辩证统一的，《康诰》全篇反映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这是对夏商时期“刑期于无刑”预防犯罪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西周中期《吕刑》中对此有了进一步的阐释——“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明确治狱要以仁德而非以残暴，“典狱非虐于德，惟虐于富”。“哀敬折狱”，用怜悯和同情来治狱，不要对犯人采取过激行为，对犯人适当宽容有利于犯人向好的方面转化。“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犯法的人只要悔改改正就可以变为不犯法的人，强调了事物可以向对立面转化。

二是省刑慎罚。“慎罚”有利于形成政治清明、社会安宁的整体氛围。周王朝初立，社会混乱，百废待兴，周公告诫王谨慎用刑，“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从于厥身”，提出“惟刑之恤哉”，“恤刑”就是反对酷刑，提倡慎重使用刑罚，说明社会管理的方式由此前的“内行刀锯”的刚性刑罚制度向“尚德缓刑”的柔性制度转变。

三是义刑义杀。《尚书》主张实行中罚，即制定合理的刑罚制度，通过恰当的刑罚治理民众，做到刑罚相当，公正廉明。周公认为殷朝法律合乎道理，要“用其义刑义杀”，他在《立政》中进一步提出“敬尔由狱……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严刑峻法和宽大处理都违背了“适度”的原则，因此主张“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强调刑罚要适度节制，治狱要秉公无私。

